

南京大学纪念鲁迅140周年诞辰

新时代语境下,如何看待鲁迅的反传统



南大召开“彷徨呐喊两悠悠——纪念鲁迅14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” 主办方供图

任何时候纪念鲁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

11月14日,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、逝世85周年,进一步整理总结百余年来鲁迅及鲁迅研究的丰厚精神遗产,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鲁迅的跨时代价值,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“彷徨呐喊两悠悠——纪念鲁迅14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”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。来自全国各地的90余位鲁迅研究专家与学者参加本次盛会。

2021年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年份,全国各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,这次会议不仅探讨了鲁迅研究的可能性及方法论意义,引发了广大研究者及听众的思考共鸣,更拓展了鲁迅研究和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空间,推动了学科史的建设与学术史的发展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
记者 陈曦

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光芒主持。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阎晶明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,《当代文坛》主编杨青,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、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,主办方代表、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分别致辞。

阎晶明说,从1898年3月到1902年1月,鲁迅在南京求学近4年。南京是他离开绍兴之后生活的第一座城市,他在这里第一次开眼看世界,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,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与人生观;他在这里东渡日本,回国之后又在这里进入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,并从这里北上。所以本次会议在鲁迅思想形成的“原点”南京召开,可谓适得其所。

阎晶明提出,鲁迅是常说常新的话题,《鲁迅全集》出版史的红色背景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。鲁迅逝世前后,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同意出版《鲁迅全集》。在当时的背景下,如果仅靠许广平、许寿裳这些亲人朋友去完成这一浩大工程也是不可想象的。而1938年,鲁迅逝世近两年后,《鲁迅全集》在抗战最紧要关头得以出版,开创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。这其中,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功不可没。

“像胡愈之这样的共产党人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包括最后选择了复社来出版,也是得到了延安方面的认可,这家社出过《红旗照耀中国》,后来又出过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,其实是一个有红色背景的出版社。《鲁迅全集》从诞生起就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政府主持下,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变得有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”阎晶明说,过去认为鲁迅研究太过政治化,要回到文学,回到人间鲁迅,今天鲁迅研究可能需要返回来,重新回到一个更重大的命题下去研究。

“现在不仅鲁迅研究是一个热点,鲁迅研究的研究,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。可以说,一个学校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水准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鲁迅研究的水准。这是因为鲁迅太重要了,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作家,也不是普通意义上

的思想家,他还是一位革命者,在一个文化走向另外一个文化、一个国家走向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节点上,他屹立在那儿。我们在任何时候纪念鲁迅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”毕飞宇说。

他以同行的眼光去看,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也是非常了不得。“在鲁迅的时代,白话文刚刚兴起,如果做一个横向的比较,当年新诗的水准跟现在的诗歌水准差得太远了。可若把鲁迅的小说,和今天作家的小说放在一起看,谁敢说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?鲁迅对国民性的把握,对人性的认知,鲁迅小说的结构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,一出手就达到了一个特别高的高峰。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,鲁迅做了非常精到的描述。时间过去了50年、100年、200年,我们发现,依然可以通过鲁迅对当下的环境、当下中国人的状况做一个基本判断。”

毕飞宇说,作为一个内心骄傲的小说家,也向许许多多的作家学习,但他始终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有其他作家的痕迹,但有一个人例外,就是鲁迅。如果自己作品中偶尔能够看到鲁迅的影子,不仅不会回避它,不仅不会把它处理了,相反他的内心顿时会有一种豪情,“我希望那个伟大的灵魂永远伴我。”

新时代语境下,如何看待鲁迅的反传统

鲁迅所处的时代,当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,康梁的改良派也不能救中国,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未能使中国人站立起来,鲁迅等反思中国为何落后,认为只有拿来西方先进思想,中国的任何东西统统弃掉,从政体文化中医京剧到汉字等都抛弃不要,才能救亡图存。在新时代语境下,在弘扬文化自信的当下,如何看待鲁迅的“反传统”?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结合郭宝昌新作《了不起的游戏:京剧究竟好在哪里》,做了主题发言《游戏之于思想——也谈鲁迅与梅兰芳》。他说,如果认识到京剧属于儒教伦理的一部分,就不难理解为何鲁迅对京剧不满。

在孙郁看来,京剧亲和观众,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之美。但是鲁迅的审美理念就与之完全不同,不是亲和观众,寻找彼此的平衡,相反,而是冒犯观众,以残酷的拷问撕裂

视觉的帷幕,告诉人们一个荒唐的存在。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对京剧的批评,其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儒教伦理走出,进入到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现代性路径的一种选择。

根据孙郁的研究,鲁迅对于京剧的游戏性、丑角表演的反讽性等,其实都有充分的认识,而且还运用到自己的创作里面来。譬如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里面有丑角的元素,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小说吸收了许多戏剧表现手段,对话和背景都有绍剧的痕迹。在这个意义上,孙郁相信,鲁迅之于旧戏,并非完全反对,传统的艺术是深化于他的血液中的。鲁迅与梅兰芳,是可以互为参照的不断生长的遗产,并非对立的存在。

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锡荣对于鲁迅“汉字不灭,中国必亡”的激进论断进行了“再思考”。在他看来,鲁迅的这个结论显然是被历史推翻了。“鲁迅的思考逻辑应该是说,由于汉字难学,造成只能被少数人所掌握,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迟滞。但鲁迅没有预见到,中国社会随着社会革命的成功,总体社会文化素质快速提高。其实,这是那个时代风头很健的思潮,钱玄同、刘半农、瞿秋白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,都是汉字落后论的积极主张者。”

“不过,汉字落后论已被科学发展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。”王锡荣说,当1980年代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没有得到突破的时候,很多人为了汉字的数字化难题而头疼,并认同“汉字落后论”。直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了突破,汉字甚至被发现有了比拉丁字更具优势的地方,这个焦虑才慢慢消退了。这说明“汉字落后论”被淘汰,建基于科学发展的突破。

王锡荣说,基于“汉字落后论”,鲁迅等新文化人提出了汉字拉丁化。拉丁化、罗马化也是当时的浪潮,很多国家还进行了尝试。虽然除越南外,几乎都失败了。1949年以后,国家也提出过“走汉字拼音化的方向”,但中文拉丁化的努力至少在目前看是失败了。未来是否有突破,这还不好说。

“鲁迅的思路,是有特定时代历史背景的。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,一批时代先进分子痛感社会进步的阻力,文化发展的梗阻,呼唤创造一种新文化的呐喊。在我们对它的做评判的时候,应当抱有这种敬意。”王锡荣说。

“习惯上认为鲁迅父亲被庸医治死,鲁迅是批判中医的。但如果就此把鲁迅视作中国现代反对中医的代表性人物,那真是极大的误解。”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在主题发言中说,在中国近现代反对中医的思潮中,鲁迅的只言片语根本不足为论。“首先,从清末开始,从官方到民间,从医学界到医学界外,一直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,但鲁迅从未写过专门骂中医的文章,只是在论及别的问题时发表几句对中医的看法。事实上,民国时期,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对中医实行限制取缔的事件,就发生过两次。其次,谈论、研究鲁迅与中医的关系者,往往混淆了中医与中药的区别,把中医与中药混为一谈。”

王彬彬说,在近现代反对中医的阵营中,一直有两种态度:一种是对中医中药全盘否定,一种则是主张“去医存药”。鲁迅可归入后者。他反对作为医学体系的中医,

反对中医的那些虚玄渺幻的理论,但又认可某些中药的有效性。如果细读鲁迅日记,还能找到鲁迅自己也服中药或以中药为亲友疗疾的记载。鲁迅也曾在杂文《经验》中说,《本草纲目》这本书,“含有丰富的宝藏”。

王彬彬认为,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,类似于陈寅恪。陈寅恪出生于中医世家,他评价中医“有见效之药,无可通之理”。“明白了废医存药是近现代的主流观念,就不难理解鲁迅忽而大骂中医,忽而大赞中药的看似矛盾的态度。”

但鲁迅对中医有私怨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“给鲁迅父亲看病的‘陈莲河’,是当时的绍兴名医何廉臣,鲁迅在《朝花夕拾》把他的名字颠倒过来写作‘陈莲河’。鲁迅小说里的中医都姓何,《狂战日记》里有‘何先生’,《明天》里有‘何小仙’,而且形象都不好,这当然不是偶然。”不过,王彬彬发现,真实的何廉臣并不像鲁迅所描述的那样迂腐无知,他是近代医学史上很重要的人物,他创办的《绍兴医药学报》,是近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医刊物,还出版过很多医学研究的书。

张爱玲是五四鲁迅文学的传人

“在张爱玲研究史上,真正最早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者,是胡兰成。傅雷是最早把两个作家的文本进行比较的研究者。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则把张爱玲正式请进了文学史。”

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川鄂通过鲁迅、张爱玲的比较研究,梳理了文学史观的变迁。他说,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个作家生前没有交集,有明显代际差异,粗看起来题材内容话语风格迥然有异,文学史评价也有很大分歧。但在重写文学史的20世纪下半叶,在多元文学史观念的21世纪初叶,他们被读者与学界频繁地捆绑在一起了。

在刘川鄂看来,现代中国作家谁也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犀利、不留情面地拷问过民族性,谁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深刻犀利、悲天悯人地拷问过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。鲁迅是国人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,深刻挖掘了“吃人”文化的传统中国之根源,张爱玲致力于“人性呱呱啼叫起来”,精微表现了在中西文化“犯冲”文化背景下国民性的变异。

刘川鄂认为,在挖掘和表现国民劣根性上,张爱玲是继承了鲁迅、继承了五四文学传统的。70年代初,水晶访问张爱玲的时候,张爱玲对鲁迅有过一段评价,她说,“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,在一种传统文学到鲁迅一死,宣告中断,很是可惜。”这是高手惜高手、大家懂大家,真正把握住了鲁迅文学与人生的关键词。

此外,贺仲明、宋剑华、陈国恩、谭桂林、高远东、张闯、李继凯等教授亦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。他们或从本体论角度出发审视鲁迅思想的流动性与自我批判面向,或在学术史意义上重新定义真正的“鲁迅传统”,或探究鲁迅研究的基本模式及研究方法,或阐释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的佛事考释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人格,或梳理鲁迅小说的“绅权”叙事,或思考《彷徨》中的“灵魂”问题,或研究“大现代”语境下鲁迅的文化修辞及精神资源。14日下午,还有30余位专家学者在分组专题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。